

目 录

前 言	周春轩	(1)
三穗县名称的来历及更名时间	吴展明	(1)
三穗古城垣的演变	周启璠	(5)
石竟成破邛水县城	李光厚	(7)
一九三九年湘黔边界晃、穗、青、玉四县边区		
侗族人民的抗暴斗争	王国华	(15)
储琢轩在雪洞的狼狈相	杨子才	(29)
三穗“同善社”与“黔东事变”	吴展明	(32)
吴宗尧在“黔东事变”中的一些活动	曾庆奎	(47)
回忆打黄梅县城	张汉廷	(53)
北伐期中我的经历	吴锡斌	(56)
我在“济南惨案”中的遭遇	胡云清	(64)
《醒碑》的始末	浅 践	(68)
丙寅年三穗饥荒拾零	李光厚	(76)
三穗第一家工厂——长吉纺织合作社	王国华	(81)
我的父亲甘凤章	甘凌杰	(84)
镇南关大捷中的杨昌魁	吴展明	(93)
万金贵外传	浅 践	(98)
陆宗夏之死	邹保熙 陆应元	姚绍云供稿 (106)
“充赖沙场忠勇士”	吴展明	(118)
民国时期三穗县历任县官名单	周启璠	(121)

三穗中学的创办·····	吴展明	(124)
雪洞“德意园”湘戏班的兴衰·····	王国华	(132)
三穗县中医中药发展回顾·····	郑大英	(138)
三穗城关“八景”简介·····	周启璠	(146)
瓦寨“三民桥”·····	杨秀隆	(154)
三穗县解放、接管和剿匪斗争纪实·····	王国华	(156)

三穗县名称的来历及更名时间

吴 展 明

三穗县原名叫灵山县，灵山县原名叫邛水县。

民国二年至三年（1913至1914），贵州省进行县区疆域调整，增设邛水、册亨等11个新县。关于邛水县，它是在原镇远县分县邛水县丞地设置的新县。在设置新县时，将青溪的南屯，镇远的响水，剑河的台烈、顺安，岑巩的大小河等地拨归邛水县，从而在邛水县丞地的基础上扩大了县沿疆域范围。

民国以后，贵州各派大小军阀自立山头，独霸一方，互相兼并，连年混战，政局不稳。在省城，谁占据了贵阳，谁就当省主席。上行下效，谁的军队控制了县城，谁就当县长（或者委派其部属为县长）。在民国十四年七月到十五年四月的十个月的时间里，邛水县长七易①，私刻“邛水县印”四次，形成了县印“真伪难分，人民无以遵守”的状况，因此要“更改县名，颁发新县印，以昭信守”，“防微杜渐，诚属实在情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那时的统治者和地方绅士把军阀的黑暗统治，兵匪横行，百姓遭殃，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说成是邛水县的“邛”与“穷”两个字的同音造成的。由于这种原因，县长袁梓材根据陆飞鸿等地方绅士的建议，于民国十五年四月三十日上报贵州省政府，经省政府主席周西成的批准，于同年六月（另一文件说是七月十

七日)改邛水县为灵山县(民国十五年六月周西成:《贵州省长公署指令》)。

为什么改名叫灵山县呢?因为“邛水地势只有永灵山一山最为特出,早列八景之一,拟仿清平县改炉山县名称,请邛水县改名为‘灵山县’”(见陆飞鸿等三十六人《呈为县印遗失自刊应用不足以昭信守恳请变更〔县名〕,颁发〔新印〕,以别真伪事》)。永灵山,又名雨灵山,在县城东北三里许,前后悬崖绝壁,其势雄伟,挺拔峻峭,山顶原有一座三层楼阁大寺庙,雄伟壮观,远近香客来朝,素有黔东佛教圣地之称。站在山顶,可俯瞰三穗全城和三穗坝子。因之,取其“灵山”二字而为县名。

民国十六年,风调雨顺,全县获得了较好的收成。在三穗后坝、中团坝、颇洞、瓦寨天王坝、坦洞八外、款场龙脚等地都有一禾生三穗的丰收景象出现,其中,款场龙脚中化地方有田一丘(田主王辉兴),座落於中化湾脚,面积二亩八分,亩产一千来斤。那时灵山县划分为八个区,款场为第八区。阴历九月上旬的一天,第八区区长王伦纪(龙脚圭录人)路过中化,看到王辉兴这丘田的谷子长势很好,金黄一片,其中有一禾三穗。王伦纪认为:中化田一禾出三穗,这是款场龙脚地区兴旺和吉祥的预兆,将来必出贵人。於是他高兴地下田摘了一把“三穗谷”,作为实物标本,用红布包好,送到县城。多少天来,毛以仁县长为改灵山县名而感到焦虑。他认为:本县由邛水改为灵山,与广东省钦廉道灵山县(今划归广西)名雷同,一则容易造成全国通讯上的混乱,二则步别人后尘来取县名,恐后人贻笑,咒骂县官愚昧无知,因此必须更改县名。正因为这个缘故,毛以仁特别征求了一些地方

绅士的意见。这个说改灵山为“灵峰”，那个说改为“赤溪”，议论纷纷，毫无结果。正在这段时间，王伦纪将“三穗谷”献上，立即轰动了全城；有的说我县一禾出三穗，这种丰收的景象，全托毛县长治县有方的结果；有的干脆提议将灵山县改名三穗县……。毛以仁综合了大家的意见，又经过一番考虑，最后作出了三点决议：（一）授于王伦纪铜质桃子形奖状两枚，以嘉奖其献“三穗谷”之功；（二）张灯结彩，置酒设宴，在县城庆贺三天；（三）派专人上省城报喜，以灵山县名与广东省灵山县雷同和“秋收丰稔，喜占一禾三穗”为理由，请求省政府将灵山县改名为三穗。

民国十七年四月十九日，贵州省主席周西成下达了“查前据该县长（指毛以仁县长）呈报灵山县之名与广东属县（指灵山县）相同，呈请更名等情一案，当经详加考核。着即更名三穗县”（周西成《贵州省政府训令第一一三号》）的文件。这是灵山县改名为三穗县的确切日期。从此以后，“三穗”二字正式载入三穗县史册之中。其它的说什么“民国十五年”、“民国十六年”将灵山县改名三穗县的说法，恐怕缺乏根据。

三穗县名确定之后，贵州各派军阀都忙于战争，对于新改县的安龙、三穗一事，均未呈报南京中央政府备案，直到民国二十年八月十八日，贵州省主席毛光翔以当时“世变纷乘，均未专案报中央备案，亦未咨行各省查照……京内各机关及各省市政府及学校、书局、报社发行之刊物。对于安龙、三穗两县仍有沿用南笼、邛水旧名者，殊嫌名实不符”等原因，上报南京，同年十月二十八日，经行政院长蒋介石批准，改南笼县为安龙县，改邛水县（实为灵山县）为三穗县，并通

令京内各机关、贵州省和全国各省市周知。

综合上述，民国二年八月（或者九月）设署邛水县，民国十五年六月易名灵山县，民国十七年四月十九日易名三穗县，一直沿用至今不变，而毛光翔在民国二十年上报南京，只是起了一个备案作用，而蒋介石的批示，也只是承认民国十七年四月十九日将灵山县改名为三穗县的既成事实，更不能作为灵山县易名三穗县的时间。

以上为笔者对三穗县名称的来历和县名更改时间的探讨。如有错误，请批评指正。

注：七易县长：杨荫寰（丁化龙委其编修代理），李文钦（白支队长白文焕委任）、万志道（万金贵委任）、欧阳精华（王梯团委任）、周魁士、杨占先（二人为杨昭焯委任），闻正俊（李团长委任）。

三穗古城垣之演变

周 启 璠

三穗县城在东经 $108^{\circ}37'50''$ 北纬 $26^{\circ}48'15''$ ，海拔610公尺，湘黔、桂穗和谷三公路干线交汇于此，素有黔东交通枢纽之称。

三穗旧称邛水，於清雍正十年（1732）置邛水县丞，属镇远分县。乾隆元年（1736）建一土城。邛水县丞置设於其内。同治元年（1862）五月，姜应芳率侗族农民起义大军攻克，将其城垣掀塌。同年八月，清（湘）军攻陷邛水，农民军撤至款场和大柱汉寨。清政府为了控制黔东这一军事要地，立即命委办路务即补运陈昌道筹修石城，置八弓游击潭应龙督工，於同治三年（1864）五月竣工。

这次新修的石城，依山势而筑，西北高，东南低，面朝中团大坝，邛水河由北归南从城东门口流过。城垣高5.5公尺，宽4.5公尺，城墙上除垛口外，可四人并行游览。城周1.35公里，有垛口炮眼1047个。建有东西南北大门四座：东即东门楼，上写“彤云”二字；南叫南门楼，又叫“定远门”；西喊西门楼；北称北门楼。东南北三处置水洞四个，可让城内流水流出城外。民国二十四年（1935），贵州王家烈政府妄图阻止红军北上，令县长潘世超在东门城角修炮楼和北门城楼修碉堡（未成）各一座。民国三十一年秋，县长刘重农慑於黔东事变之威力，在县政府内最高处修碉楼

一座，又叫炮楼，可控制全城。

解放后，因国家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基建急需石料，於一九五一年、一九五四年、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九年先后拆除城垣石料，如今只剩下残墙遗址。

石竟成轶事

李 光 厚

民国七年九月初六（1918年10月10日），上德明人石竟成率众八百余人攻破邛水县城，打死一区区长王培山，重创二区区长李焕章，县长刘子宪（字懿卿）男扮女装弃城逃走。义军进城，劫富济贫，火烧县衙文件，当日撤向长吉、瓦寨。10月12日，与黔军在马龙潭激战；夜晚，义军各部散归绿林。石竟成辗转于顺洞、观摩、岑松，再回到报京、松柏澗一带，坚持武装斗争。次年，在杨赞卿（又称孙官先生）大力调停下，接受招安，石竟成任黔军营长，进驻洪江，后死于镇远。

一、破城前的情况

石竟成（1885——1921年），原籍贵州松桃县，苗族，贫苦农民出身。自幼流落到上德明，十岁时给孙官先生家看马，性情豪爽，喜交朋结友，打老庚拜兄弟。及其稍长，四出交游，去来常住杨赞卿家。

民国初年，贵州军阀为了搜刮民膏，加强对各族人民的统治，邛水、镇远各县划区设乡，严行保甲制度，加重捐税盘剥，对少数民族更加歧视，稍有不遂即被诬为“苗匪”。稿荣、铜鼓、塘冲、囤牛都是离县城五、六十里的苗族山寨，

农民被征大批粮谷要挑下八弓，官府设总办监督。绞颇杨子冠任总办，大肆敲诈勒索，这一带群众对他恨之入骨。

石竟成有志反抗官府，据说他很佩服石老华（清末在松桃边境起义领袖）。1905年起，即在镇远南区拖帮结队，与报京周国清、周玉明，松柏洞田毛弟等，组成武装，与官府作对。他经常出没镇远、清江、王寨一带劫大富，打船只。开始势力不大，丁未年（1607）打内寨财主田宇生，攻不进寨，田在寨中高叫：“你们进来吧，我这里有银牛银马！”次年，石部在寨洞被官军打败，两个追兵紧追石竟成不放，是看中腰间的包袱。他机智地装上一袋石头扔下路坎去，官兵以为是银子，忙去争抢，竟成得以走脱。以后拖帮到湘西一带，几年不上来，石竟成在湖南，受会党的影响，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打富济贫”的口号，还在湖南截击了三支正规军，缴了几十条枪，声势大了。因此一九一四年石竟成回到镇远南区，人也多了，枪也多了。当时许多绿林邦股都服他号令，尊他为石大哥。塘冲的吴老四，绰号吴叉口，使一把护手刀有八斤重，即加入石部。松明的向玉清，大棚坳的潘岩英也陆续入伙。巴冶的万金贵也“愿受派”。一时，附近各县都闻石竟成之名，大有谈虎色变之态。

二、破城的起因、经过、结果

一九一八年八月，稿柴杨士司的后裔杨富清，骑一匹枣红马来县城赶场，八弓区区长王培山看中这匹马要买，杨不卖，来人说是王区长要。杨富清拒绝地说：“区长骑得难道我就骑不得？”当天晚上，王指使手下人把马偷牵去放到桑

园（现法院宿舍一片），践坏了不少桑苗，当即以“破坏桑园”的罪名论处。点得桑苗七百棵，要七百块大洋，把马抵押还不够数，还勒令杨回家取钱。先是，杨富清和石竟成打老庚多年，往来密切。杨受陷害气愤不过，就和杨传彬一起去请石竟成报仇雪恨。石竟成干脆地回答说：“只要大哥动手，要钱有钱，要人有人！”邛水县长刘子宪，一贯鱼肉人民，对民族地区严格控制，动辄就“以匪论处”。石竟成决定要惩治他。于是着手准备，联络各地力量，伺机破城。十月初，传檄各部待令，石竟成亲自带队到巴冶集结。巴冶在万金贵多年经营下，武装力量较强。当时，万金贵外出不在，由赵老余（人称余队长）率众加入石竟成部。

刘子宪只闻报巴冶有“匪情蠢动”，尚不知石竟成大队在巴冶，他一如继往实行弹压，率一百多官兵，由大队长姚大汉带领，直扑巴冶。十月九日（九月初五日），姚大汉队伍到石弄，早饭未及吃，就被义军打败逃奔。此时刘子宪驻在台烈保长刘恩荣家，闻报巴冶惨败消息，慌忙坐滑竿向八司逃走。刘恩荣、周清贤等地主拦路哀呼“县长走了，我们咋个办！”刘子宪说：“我一两天就回来！”姚大汉断后，刚出台烈一里多，就被义军追上打死在懒板凳的田里，并把头割下，用稻草包着，抬来放在台烈中间街的上地祠里示众，有好事者还在姚大汉的口中燃放纸炮陪戏。

石竟成是打富救贫的，他用歌谣的形式提出口号：“上等之人欠我钱，中等之人莫照闲，下等之人跟我走，肉里困来酒里眠！”这口号旗帜鲜明，鼓动性很强，得到很多贫民的拥护。

义军不扰百姓，百姓也不避义军。台烈对门寨保董杨占

标向寨民喊话：“大家快躲，土匪来得多！”大家并不躲，有人还过街来看热闹。对地主，义军是要“冲耙槌”的。在台烈街上冲了胡启玉家和周清贤家。“不是拜年，是来收钱！”大叫一声，打开大门就冲进去，把胡家两睡柜铜钱全撒在街上，对看热闹的人说：“石大哥给大家进财！”

义军在台烈稍稍整顿，即摸黑奔下八弓，星夜围城；吴老四也从上德明一线赶来；另一路由良山下矮子秧进城。围城的共计八百余人，每人搓一根草索斜捆到肩土作标志。

刘子宪从台烈逃跑进城，一路调兵遣将。二区区长平树的李焕章被叫去守城，他带七、八个团丁，一进城就被围困了。城中有一百多个团丁，但已是瓮中之鳖，毫无抵抗力量。在县城岌岌待破的情况下，刘县长请出孙官先生去和石竟成谈判，想要义军莫破城。

孙官先生是清末绞颇杨统领昌魁的师爷。他跟杨统领下过山东，参加过镇南关大战，名气很大，解甲归田后重操教书旧业，城乡的拔贡、举子、缙绅、名士如周伯庸、王东蕃等，无不是他的门生。石竟成在他家生活多年，多得孙官先生的照顾和教化，石竟成十分尊重他。早在三年前，孙官先生为避免“通匪”的嫌疑，全家搬进县城居住，就住在现在农牧局处的连五间房子里。城乡的地主豪绅，慑于义军的声威，纷纷携带家眷钱财，逃奔县城躲避，如平树李万年家、六寨周西如家，以及街上的陈绍兴、鄢如山等，一些商家老板，如许裕清、杨佩章也往城里躲，大家认为“县城是不轻易破的”，都把财物朝城里搬。义军围城时，有名气的豪绅地主几乎全躲在孙官先生家，楼上楼下，连床脚都塞满了人，刘县长和安师爷也躲在他家里。孙官先生成了大家的保

护伞。

孙官先生受县长之托，从城墙上坐箩筐垂下，大喊竟成的乳名：“石老毛！石老毛！”石竟成迎见他。“县城还是莫破吧！问是有教还是无教？（绿林暗话）”石竟成口尊：“先生公”，但态度很坚决，推说“各路兄弟不同意！”孙官先生再三要求，石竟成提出的条件是：“第一要杀刘子宪，第二要杀王培山，第三要杀杨子冠，第四还要银八千！”条件提得干脆利落，要从县长杀到总办。谈判不成，孙官先生只好回到城里，连说几个“难办！难办！”把刘子宪吓坏了。为了保命，他开冷枪打死王培山，又到死牢里砍了一个头交出，造成假象，妄图迷惑义军，但亦不能息怒义军之愤。

十月十日（九月初六日）上午，义军发起猛攻，用长梯子爬城墙，用大石砸开东门，蜂拥入城。一个守兵在东门点“猪崽炮”，炮一响反被震死。破城时，更夫陈海洲（后街人，人称假哥老杨）参加义军，里应外合。二区区长李焕章翻西门背城墙逃跑，被义军砍了九刀，砍通身上七层衣服，砍断一把辫子，缴了一支六响手枪，他装死才得幸免，所带团丁李志国被冷枪打死。刘子宪和安师爷趁混乱中扮成打猪菜的妇女，从北门逃向镇远。

石竟成破城，“只掳城内，不掳城外；只掳大户，不扰平民”（摘自三穗同善社护道金执事李文彬当时日记）。城乡地主的财物多聚集在城里，“掳富户一百余家。焚毁县衙”，实际上只是烧了政府的箱箱柜柜档案文件。财主的箱笼家什，掳来堆在关帝庙中，取了财物后，搬不走的也烧了。又掳了厘金税局和许姓、秦姓几家商号。

城里唯一没有掳的是孙官先生家。石竟成一进城，就在孙官先生家门口插一大把白蜡叶，告示部下不准进屋。孙官先生则手拿一把燃香，插在阶沿坎上对天祭祀。这把保护伞保证了许多地主及其家眷的人生安全，至少不受惊吓，虽然义军并不乱杀人。

石竟成破城后，下午即向瓦寨撤走，一路上把财物散给穷人。东门口撒了许多岩盐，河坝街、大桥上的叫化都得到新被窝盖。义军一股翻白泥山走长吉，一股由金竹沟过矮子秧。长吉放炮迎接，杀猪宰羊犒劳义军，石竟成整队进街，人财安然；长吉区长邹万生，夜晚在矮子秧守卡，向义军来的马灯方向打了几枪，打死两名义军，结果矮子秧场坝街被一火烧了。

刘子宪从镇远请来黔军老一团第三营，用马驮着枪炮弹药，向义军驻地瓦寨追来。石竟成高兴地说：“给我送枪弹来了！”即率众迎击官兵。十月十二日（九月初八日），义军在马龙潭与官兵鏖战经日至夜，各部纷纷散去。石竟成率队撤向顺洞，辗转于观摩、巴冶、岑松等苗族山区。后又回到报京、松柏洞一带，继续进行武装斗争。

马龙潭一战，双方均有伤亡，但死人不多。贵县人吴开科当时是义军中的一个小头目，他说：“到瓦寨，石竟成有一千多人，马龙潭打大仗，这些人也不见死几个，一夜工夫都不见了。”

三、石竟成受招安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春二月，石竟成为了超度他的

阵亡将士，在岑松设坛做水火炼度（即道场），雇请青洞田雨清做掌坛师，做七七四十九天大斋。时值军阀队伍清乡，岑松被一个叫罗塌鼻子的军官大肆杀掠，给石竟成做过道场编香的、挑水的等等，全部当“土匪”杀掉，共死四十多个无辜百姓。

恐怖传遍各地，寨头区长万金权巴结官府，把参与石竟成起事的寨头人万岩林、万金麻子、万溜子，杀死在牛尾坡。

三月，官军周营长带队由上德明以上清乡，在爷木坳与石竟成交战，打死官兵三人，至使清乡不成。

当时贵州军阀王文华、刘显世为了巩固和扩充自己的力量，好去争权抢地，对省内各“匪帮”实行招安政策，收编各部地方武装以充实兵力，特别是象石竟成这样能打仗能带队又有威望的人，更是他们收买的对象。省里派黔军老一团周昌朴和参谋向振机来镇远一带主持招安事宜。周昌朴精明能干，后升任参谋长，北伐初随袁祖铭入湘，到常德被害。在杨赞卿的大力调停和精心安排下，周营长亲自到大山沟和石竟成谈判成功。向振机来收编队伍，对石竟成说：“你有多少人，就当多少人的官。”

石竟成对杨赞卿说：“我只会拖邦打仗，怎么会当官？你要二先生和我去我才去！”二先生是杨赞卿的二儿子杨讼枝，聪明多才，贵阳达德中学毕业。杨赞卿只好派他去给石竟成当随军编修。随石竟成一块，多是他的老部下，仅上德明就去了二十余人，如排长杨令帮、哨官杨昌义、马弁杨金由等。

石竟成招安，全赖孙官先生之力，为此，省政府奖给孙官先生一块金字大匾，六尺长三尺高，正中是“惠此下民”

四个大字，右书“杨赞卿先生年逾八旬东路招抚于国有功”，左边落款是“贵州省督军刘显世题赠，中华民国八年十月”。

石竟成当了老一团第三营长，奉命进驻洪江。洪江是贵州通湖南的咽喉，扼水陆交通要冲，工商业发达，是湘黔军事重镇，当时湖南军阀忙于内讧，黔军驻洪江是很重要的。

石竟成于一九一九年到洪江后，虎落平阳，受人节制，志向不能伸达，整天悒悒不乐，乃沉于酒色。一年后身染重病，转回贵州，在上德明买了一片屋基。没有子嗣，分松柏洞下寨石占花为子，带二妻居住镇远西门街沟口。一九二一年八月，石竟成病，肚痛如绞，不能自己，大叫一声：“弟兄们叫我这样死么！？”乃以腹抵尖刀而死。时年三十六岁，葬于东关上。

注：此文系根据明泽渊（76岁）、吴锡武（74岁）、邵昌应（84岁）、郑大英（84岁）、李万发（78岁）、耿昌权（72岁）口述整理。

一九三九年湘黔边界晃穗青玉四县 边区侗族人民的抗暴斗争

王 国 华

一九三九年湘黔边界的晃县、三穗、青溪和玉屏四县边区侗族人民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残暴统治，掀起了以反抗兵役为主的抗暴斗争（群众叫“抗兵运动”）。这个斗争起于一九三八年冬天，止于次年秋天。地域涉及四县边区的十多个乡，数百个村寨，千多平方公里。从事件的酝酿到结束，将近一年时间，其中经过激烈战斗，人民付出了代价。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打击了地方政府的暴虐统治，加深了这个地区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认识。是这个地区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在反暴政反压迫的斗争历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

一、事件的起因

一九三七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摆出了抗战的姿态，但在很短的时间里，它的军队就节节败退，大片国土失守沦陷。蒋介石集团在日本侵略者的政治诱降下，改变了内外政策，制订了一套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前方，他们回避敌人，在后方，不是积极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日，而是百般刁难限制群众的抗日活动。国民党政府在“坚持抗战”的幌子下，积极扩充军备，